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190期)

本期要目

- “山水名片”遭破坏 桂林官员称得不偿失
- 世界遗产在中国版图上星罗棋布
- 最高法：违法在风景名胜区开矿，认定合同无效
- 谁该为千城一面的古镇买单？
- 祁连山被点名，风景名胜区要警醒
- 日接待量突破1.8万人 莫高窟游客爆满不堪重负
- 山水长存 天人各宜——法国国家公园面面观

2017年8月5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 “山水名片”遭破坏 桂林官员称得不偿失 -----3
世界遗产在中国版图上星罗棋布 -----6

新闻摘要

- 最高法：违法在风景名胜区开矿，认定合同无效 -----13

社会纵横

- 谁该为千城一面的古镇买单？ -----14
遍布鼓浪屿的低调标识牌 -----17

时事评论

- 祁连山被点名，风景名胜区要警醒 -----19
国家公园：保护第一 公益优先 -----20
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可以并行不悖 -----23

世界遗产

- 日接待量突破1.8万人 莫高窟游客爆满不堪重负 -----26

环球博览

- 山水长存 天人各宜——法国国家公园面面观 -----28
-

“山水名片”遭破坏 桂林官员称得不偿失

【经济参考报2017年7月18日】“七星区采石场几年的税收约100万元，生态修复却花了近1000万元，而且破坏了生态环境，真是得不偿失！”桂林市七星区副区长易理冬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感叹。

桂林山水甲天下，号称“中国山水名片”的漓江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级旅游景区。一度存在的漓江流域采石挖沙等行为，特别是一些采石场甚至无证非法开采，使漓江流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去年以来，当地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挂牌督办下，着力整治违法违规开山采石问题，20多家采石场被依法取缔，37人被问责。昔日的采石场已进行生态修复，“披”上了草丛植被。但山体修复难度大、周期长，漓江流域“山常绿、水常清”依旧面临挑战。

调查：漓江“诗情画意”曾惨遭采挖破坏

众所周知，桂林山水以“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绝闻名中外。被誉为全球最美河流之一的桂林漓江，沿江喀斯特地貌已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作为桂林山水核心景观的漓江，是中国一张靓丽的“名片”。

然而，漓江周边疯狂采石、挖石灰岩矿，扰乱了漓江的“诗情画意”，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安全，一些场景让人触目惊心。去年3月，《经济参考报》记者驱车沿着漓江，从桂林市到阳朔县走了100多公里，一路看到多处采石场。在阳朔县葡萄镇一家采石场，紧挨着的3个山头被采挖，一座小山即将被挖平。采石场一位负责人指着一个个山头数给记者看：“这5座山都是与村民签订了10年的租赁合同，相当于被我们买断了。目前每天采石量1500立方米。”

在漓江周边采石挖沙投入小、利润却很大，巨额暴利导致疯狂采挖行为。当地干部告诉记者：“一年山场租金只有几千元、上万元，矿主赚得盆钵满满。”他们还反映，因非法采石采沙不触犯刑法，处罚也不重，管理起来更加困难。

桂林漓江于1982年获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务院令第474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前年，桂林市政府曾对六区两县范围内的64家采石场分别按关闭、停业整顿、限期整改三种类型进行分类治理，然而，部分采石场经整顿、整改后依然存活。

“漓江流域山体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层稀薄、植被生长难，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桂林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郭纯青说，采石挖山是掠夺性、毁灭性的，加速了岩溶石漠化进程，破坏了沿岸江洲的蓄水能力。而且喀斯特地貌地下联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密集，一些污染源可能经过开采口和溶洞进入漓江，整个生态系统遭到污染和破坏的风险很大。

回访：绿植稀稀拉拉 山体修复难度极大

记者近日再赴桂林市和有关县区进行回访。在灵川县大圩镇廖家村，记者看到，3家露天采石场采石设备和厂房已全部被拆除，山间的平地上种上了狗芽草等草类，陡峭的山体上种植了一排排植物，铺设了水管，施工时悬挂在山体上的缆绳还在。抬眼远望，原始的山体绿树葱葱，而被采石破坏的山体经过修复，能看到稀稀拉拉的绿色植物。

“山体修复施工的难度极大，山体整体坡度达到80度，机械上不去，只有靠人工。”灵川县甘棠江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罗荣亮说。工人需要先在陡峭的山体上钻孔，插入钢钎，绑上铁丝网，铺上无纺布，建成一条条V型槽，再往V型槽里倒入泥土，种植植物。

记者在阳朔县葡萄镇东风采石场看到，入口处铺设了一层厚厚的红土，3名工人正在红土上种植植物，之前堆放石料的平地上虽然遍布碎石，但斑马草等植物生长良好，山体上一排排V型槽里也种上了草。

桂林市七星区副区长易理冬介绍，七星区佳兴采石场被露天开挖多年，山的西侧、北侧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尤其是西侧破损严重，局部形成危岩体，最大坡高达150米，坡度为70-90度，局部形成多处反坡。山下平台通过堆土造坡手段，种植乔木、灌木、草类进行修复，山体上则通过V型槽、植生袋等进行修复。

据桂林市环保局介绍，漓江风景名胜区范围内18家（其中2家位于核心

区、16家位于控制协调区)采石场和灵川县3家采石场均已完成了关停、证照注销等工作,厂房、设备已全部拆除,并按照“一场一策”方案完成生态复绿工作,完成生态修复面积136万平方米。“仅21家采石场复绿恢复生态,目前已投入资金约2.58亿元。”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因在漓江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违规建设采石场问题,桂林市相关部门共37人被问责,包括处级干部15人。

后续：“靠山吃山”的村民生活出现困难

马家村村民马乾生几年前发现石料运输“有赚头”,于是购置一辆中型卡车,主要为采石场运输石料到各建筑工地,一年至少有5万元利润。采石场关停后,他只能把卡车低价处理掉,现在到各处打零工。不仅是马乾生,马家村40多辆运输车多半已经卖掉。

马家村田地很少,采石场曾是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涉及3个村民小组约230户村民,每年可以为村集体带来70万元的租金收入,还可以安排大量就业。采石场关闭后,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村民只好赋闲在家或者外出打工。

不过,对于关停采石场,大部分村民表示支持。“炸山震得一些房屋开裂受损,没几天桌上就积了一层厚厚的灰,虽然少了一笔收入,但环境变好了。”大圩镇敢兴村委会副主任熊芳运说。

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表示,采石场的关停和修复改善了漓江流域生态环境,避免“青山绿水”进一步遭到破坏。但与此同时,一些“靠山吃山”的村民生产生活也出现困难。易理冬感慨:“七星区采石场几年的税收约100万元,生态修复却花了近1000万元,而且破坏了生态环境,真是得不偿失!”

“目前村里已经和企业签订合同,村民用土地入股,由企业开发以前的采石场,种植花草、发展观光农业,门票收入的30%分给村民,但旅游业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真正见效还需要时间。”廖家村党支部书记马连满说。

基层干部反映,关停采石场后石料价格大幅上涨,仅灵川县石渣价格就由原先每立方米约30元涨至80多元,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很多项目不得不追加预算。一些群众因建房成本增加亦有怨言。他们呼吁,亟待加强统一规

划安排，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保证建筑材料的供应。

专家：尽快建立漓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山水旅游“名片”，漓江流域的生态综合整治与管理“拖不起、等不得”，建议统筹考虑，尽快建立漓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首先，当务之急是尽快立法，让漓江保护有法可依、执法有据。郭纯青认为，既要注重漓江核心景区，也不能忽略与之紧密相连的周边地区。应按照“大漓江”的保护理念，尽快制定漓江上下游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确保漓江生态保护有法可依、执法有据，形成切实有效的大环保工作格局。

其次，漓江流域的综合治理应由更高层面统筹开展。20多家采石场复绿工作目前已投入2亿多元，后续仍需加大复绿养护力度。同时，漓江及其支流的截污工程也需要大量资金。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桂林市经济总量小、财政实力较弱，现有财力已难以完全履行保护漓江的事权，希望将漓江流域的综合治理上升到更高层面统筹解决。

第三，通过对口帮扶等方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设立漓江生态保护基金。部分受访人士认为，目前对漓江沿岸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群众参与漓江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可通过发达地区对口帮扶等方式，对漓江上游和沿岸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向受益者收取补偿费。受益单位和个人，要缴纳生态税。

（记者：何伟、唐荣桂）

世界遗产在中国版图上星罗棋布

【新民周刊2017年7月24日】苍鹰在天空盘旋。藏羚羊瘦小的身影点缀在一望无际的高原戈壁上，马占林久久地站在日泰无声的尸体旁边，不远处是正在离开的他的同伴，远方的山峦静默起伏，残阳如血……

陆川《可可西里》的镜头如此深刻地烙印在观众的心上，让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而现在，电影中描述的悲情故事将成为历史。

7月7日，在波兰举办的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宣布：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8日又宣布，中国福建省“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9日，江西铅山武夷山成功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至此，中国已拥有52处世界遗产。

自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在申遗的道路上走过30多年，已经成长为世界遗产大国。

欣喜之余还有忧虑

1987年，法国雪铁龙公司打算为最新款的AX车型拍一个惊世骇俗的广告——他们一眼就相中了中国的长城，在长城上飙车，那绝对吸引眼球。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段长城的废墟遗址，想要在上面拍一段开雪铁龙车子的广告。这样，在他们看来不过是打个擦边球，却可以达到最大的市场效果。

当地政府很积极，可是到了文物部门却遇到了阻碍，他们坚决不同意，于是当地领导就向上级部门汇报：“改革开放形势大好，连雪铁龙汽车公司都要来我们这里搞合作项目，他们要拍一个广告，汽车在一段坍塌的长城废墟上开这么一下，但文物部门就是不同意，他们搞封建迷信，说长城是龙，雪铁龙也是龙，不能让他们的龙轧了我们的龙。”

这位上级领导一听到封建迷信就特别反感，没做更多的调查，就批示同意雪铁龙在此拍摄广告。原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兼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当时正在法国，他的法国朋友和他吃饭聊天时突然问道：“郭，最近我们法国电视台出了个丑闻你知道不知道？和你们中国有关。”

郭旃有点纳闷，不知道什么事，说：“不知道，你跟我讲一讲怎么回事？”

“法国电视台播了一个广告，雪铁龙汽车开上了长城，广告播出之后，一两分钟之内收到了上百个电话，全是法国人打来的，说我们法兰西民族是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怎么能允许我们的一个商业广告，我们的汽车开到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躯体上？这是羞耻！”

郭旃感觉汗颜，更深切地感到要让国人具备更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还任重道远。

提到武夷山，不少人第一反应是“福建武夷山”。其实，武夷山跨闽赣两省，介于江西的上饶、铅山与福建的浦城、武夷山市等地之间。而今年入

选的江西铅山武夷山是福建武夷山的北段，同样拥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此之前，1999年，福建的武夷山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在申报过程当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申报了三四年，才实现了这个夙愿。郭旃回忆说：武夷山申报了之后，领导们不在意主动的宣传和介绍说些什么，而是到游客中去发现问题。他们到了景区，发现里面插挂着不少“严禁攀登”“严禁烟火”“严禁刻画”的指示牌，这些警示都是对的，但是你设想一下，一个不锈钢的牌子，上面写着大红字，往竹林里一插，是怎样的“风景”？过去不注意，现在会很在意，因为不协调。还有，古树上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严禁烟火’，也会觉得很扎眼。通过“申报遗产”，大家知道了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一点儿不干扰景观。后来我们的游客来了，大家一边看一边感叹说，哎呀，没想到咱们国家也有管得这么好的景观，当时主管遗产申报的领导也觉得很欣慰。申报遗产成与不成，本身当然很重要，但不是根本目的，通过遗产申报，真正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了，保护管理水平提高了，这才是最根本的作用。”

30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通过申报和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自然和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环境景观得到有效的整治，文化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提高了文化自信，极大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不仅如此，申遗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极为有效的宣传手段，借由申遗，我国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进入全世界的视野，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和欣赏，同时也推动了各国各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虽然30多年来，中国的遗产申报和保护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像野长城被浇上水泥抹平的事件还时有发生，这让我们在申遗成功的欣喜之余，多一份忧虑，多一份不满足于现状的努力，只有这样，我们的遗产保护工作才能更上层楼。

申报过程极其复杂艰苦

随着世界遗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日益显现，使世界遗产委员会考虑加大审查通过的难度。从明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实行“新限额制”，即每年每个缔约国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项目（所有类别加起来只能报一项），

全球范围内每年最多也只审查35个项目。而在此之前，审查已逐年收紧。

在越来越严苛的评选标准下，如何才能申遗成功？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苦的过程，需经过若干个阶段，大体上需要经历：列入预备名录、完成申报文件、成为候选项目、通过国际专业机构考察、接受委员国评估等几个步骤，而中间还涉及很多琐碎的流程。一项遗产从提议申报到最终成功，有的甚至要经历十几年的时间。

首先是“预备名录”，即某项遗产如果被认为具有申报潜力，当地政府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制定申报策略，开展资源保护、管理机构设置、环境整治等工作后，向有关部门申报进入遗产预备名录。只有先进入到这个预备名录，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备案后，才算真正具有“申遗”资格，获得了入场券。

进入到“预备名录”后，遗产地要继续在申遗文本、资源保护、管理规划、遗产监测、公众参与等方面深化，首先要自身准备完全成熟，再等待国家的统一部署。

世界遗产中心的主任弗朗西斯科·巴达兰每次都会收到中国方面为提名而准备的大量资料：“多得不得了，你会发现成吨成吨的资料，一般来说非常沉重，里面包含了大量图片之类的资料，还包括科学数据、各类文档等材料。他们在这方面非常认真，想必花了不少时间与心血。如果要准备得细致，你可能会花上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把报告呈递给我们。”

世界遗产委员会由21个国家构成。这21个国家，每两年更换7个。每个委员国最长连续任职不能超过6年。不过现在为了让更多国家参与，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每个国家最长只能连续4年担任委员国。在每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会议”，即惯称的“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委员国就申报的新项目、已有项目的保存状况、濒危名录的更新以及其他议程进行为期十天左右的讨论。如果出现严重分歧，将采用投票方式进行决策。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对申请列入名单的遗产项目进行审批，其主要依据是该委员会此前委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有关机构和专家对各国的提名地进行实地考察而提出的评估报告。

不过，IUCN和ICOMOS的意见，只是给21个委员国“参考”，并不是说这些意见就是最后的决定。尤其是近年来，两者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越来越

越多，其中还有很多的确定性，绝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数量领先的责任和义务

我国此次连中三元，又是因为可可西里、鼓浪屿、武夷山三地拥有怎样的特质呢？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中是“美丽的少女”的意思，但在这个人烟稀少，平均海拔近5000米的土地上，给人的感觉首先是自然风光的美丽，这里蓝天和大地的色彩对比强烈，没有任何空气污染，空气透明度很高，还有美丽得像眼睛一样的湖泊，平静地倒映着天空，这是最让人感到心灵沉静的时刻吧。

近年来，经过国家的治理，盗猎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已得到有效遏制，把美丽的风景归还给自然之后，它迎来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喜讯。

鼓浪屿是以全岛作为一个整体申报世界遗产的。申报范围包括鼓浪屿全岛及其近岸水域，缓冲区涵盖邻近的大屿和猴屿两座岛，并一直延伸到厦门岛海岸线。岛上最直接展现遗产价值的代表性要素，当数51组历史建筑及宅园，包括工部局遗址、会审公堂旧址等工部局时期的社区公共管理机构遗存，体现中外政治、商贸、文化交流的各国领馆、中外商贸金融机构等驻岛机构遗存，综合反映当时鼓浪屿社区服务近代化水平及多元文化交流的各类宗教、文教、医疗、文化娱乐等公共建筑遗存等等，共同构成了鼓浪屿自然有机的空间结构和内涵丰富的城市历史景观要素。

世界遗产中心的决议认为，鼓浪屿的突出普遍价值在于，通过当地华人、还乡华侨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外国居民的共同努力，鼓浪屿发展成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现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也成为活跃于东亚和东南亚一带的华侨、精英的理想定居地，体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人居理念。ICOMOS认为，鼓浪屿展现了在亚洲全球化早期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互动和融合，其建筑特色与风格体现了中国、东南亚及欧洲在建筑、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上的交融。这种交融的产生得益于岛上居住的外国人和归国华侨的多元性，并因此形成一种全新的建筑风格——厦门装饰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在鼓浪屿发展，还影响到广大东南亚沿海及更远地区。

而之前少人关注的北武夷山——江西铅山的武夷山，也是江西首个世界

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全球环境基金会”委员和专家经过考察后，对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致赞扬，并将其正式列入“GEF——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之一。这里不仅有独特的自然遗产，还有丰厚的人文遗产，铅山鹅湖书院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中心。温林关、观音关、分水关、马铃关、桐木关、云际关、火烧关、鸭母关等铅山武夷山八大关隘也为当地人所熟知。

第一时间得到可可西里等三处自然及人文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高兴兴奋之余也深感责任在肩：“我国世界遗产数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是由中华民族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分布宽广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我们应更关注世界遗产的保护责任与义务。这是中国政府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我国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我们肩上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沉重。”

世界遗产在中国的分布特点

自1987年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泰山等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以来，我国世界遗产总数现已达52项，仅次于意大利的53项，名列世界第二。其中包括湖北神农架等12个世界自然遗产、云冈石窟等36个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等4个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它们把最丰富的基因库和最悠久的历史代表作推向全世界。

其中，首都北京坐拥7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之最”。

北京的世界遗产包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故宫、长城、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大运河7项之多，而且均为文化遗产，不啻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体量担当”。而在这些遗产中，多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建筑遗迹，这充分突显了北京的“皇城”气质。

除了首都之外，世界遗产不都是散落在各地版图上的“明珠”，也会有串起的“项链”，这些“项链”就是线性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呈线形或带状分布的文化遗产族群，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大多佐证了早期人类的活动轨迹，记录了区域文明的交流互动，

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交织了空间和时间要素的综合体。

中国的大运河、长城、丝绸之路，就是录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线性文化遗产，而茶马古道、灵渠、徐霞客游线等线性文化遗产虽然不在名册之上，但也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化价值，未来或将进入“世遗”预申报的梯队。需要说明的是，线性文化遗产并不是世界遗产名录中明确划分出的一个类型，但由于它常常伴有丰富的样态，以及极高的文化集群价值，所以引发了人们的关注，日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新兴概念。

徐霞客游线就是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浙江省宁海县作为徐霞客游线的始发地，近年来牵头路线上各节点的地方政府，一同为游线“申遗”发声发力。自2003年开始，宁海每年都会围绕“徐霞客游线申遗”举行系列活动，以增加国内外社会的关注，2011年，更是成为“5·19中国旅游日”的发起地。申遗过程中，宁海政府逐渐带动起自身旅游产业和地方文化的发展，甚至引领了全国旅游文化的新传统。

然而，就以往经验来看，线性文化遗产的申报，不能仅靠“一点发力”，而是要“多处做功”，它需要多地政府联动配合，也需要更加大量的准备工作，其申报难度和含金量不言而喻。

而中国的世界遗产还有南北差异——北方多文化遗产、南方多自然遗产。

通过观察世界遗产在中国的分布，我们不难发现：文化遗产多分布在北方，而自然遗产多分布在南方，呈现出“南看山、北看楼”的特点。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政治、文化中心长期处在北方，所以北方更容易缔造出明清故宫、长城、秦兵马俑等这样历史感厚重的文化地标；而对于南方而言，虽然也有像客家土楼、苏州园林这样出色的建筑，也不缺乏庐山、鼓浪屿、哈尼梯田这样遗世独立的综合景观，但自然遗产仍旧是南方“世遗”的主力军。如分布在南方各丘陵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横断山脉下并驾奔腾的“三江并流”，无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造。可以说，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给了南方一笔丰盈的馈赠。

世界遗产在中国版图上星罗棋布，展示着国土之上那些耀眼夺目的自然奇观，也彰显了一个民族包罗万象、横亘古今的文化气度。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世界遗产”终究只是衡量名胜价值的一种国际化标尺，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很多蛰伏在角落中的瑰宝，不加以同等的重视和保护，可能也将濒临绝迹。“世遗”名册之外，那些拥有足够价值的自然文化遗产，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自我认可和保护。

（记者：何映宇 实习生：马庆隆）

新闻摘要

最高法：违法在风景名胜区开矿，认定合同无效

【北京青年报2017年7月27日】最高法27日发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明确了自然保护区等特别区域内的勘查、开采合同效力问题。

当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解释还明确，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内禁止勘查开采。

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表示，有地方为促进经济发展罔顾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有悖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法院应适度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对上述特别区域内的矿业权合同效力进行特别审查。

“国土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破坏的事例和案例很多。”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认为，这些保护区之所以划定，是因为它具有生态系统的代表性，保护区域内具有特殊的动物、植物和特殊的生态价值，正是因为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国家才予以保护。

“如果开发权人为了自己短期的、集团的甚至一部分地方局部的经济利益，只算小的经济账，而不算大的环境账、生态账的话，行政机关要处理，法院也会依法履行职能，认定这类合同无效。如果造成损害的，国土、环保等有关部门还要依法追究他的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解释》还将涉矿环境公益诉讼纳入其中。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损等生态破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别涛解释，上述“法定机关”包括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所规定的内容。根据试点方案，经国务院授权，省一级政府可以指定有关机关或机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作为国有生态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人，代表国家，针对开采过程中对公共环境的损害提起公益诉讼。

此外，依法登记的合法环保社会组织，没有违法的不良记录，符合条件的，也可以以NGO社会组织名义来提起诉讼。

（记者：孟亚旭 实习生：李慧石）

社会纵横

谁该为千城一面的古镇买单？

【工人日报2017年8月2日】如今，古镇游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一个主力军，每逢节假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涌入各个古镇，一方面增加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拉动了经济发展。也许正是看到古镇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影响力，近几年，中国古镇的开发建设力度近乎疯狂，而其背后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最直观的一点便是：中国所有的古镇为什么都一个模样？

不去会后悔，去了更后悔

“千里迢迢带着孩子从外地过来，逛了两座古镇就想回去了。”近日，

吴女士趁着孩子放暑假，特地向单位请了年假，带着孩子从广州飞到重庆，就是想让孩子领略一下重庆古镇的魅力，结果此行让她大失所望。“之前看很多介绍，发觉重庆的古镇底蕴深厚，人文丰富，但真正来了后，感觉遇到了一个‘假古镇’。”吴女士抱怨，不管哪座古镇，都长得差不多，毫无特色可言。

记者在重庆某座古镇走访时，恰巧碰见了来自吉林的徐先生，他也是利用年假时间专程来游览重庆的古镇，而他也遇到吴女士一样的困惑。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度假前特地做了一番攻略，选定了重庆几座古镇，但游览了一圈下来后，发现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都差不多”。“建筑风格差不多，古镇格局差不多，就连售卖的旅游纪念品都差不多。”徐先生苦笑着说：“看网上有人说，中国的古镇不去会后悔，去了更后悔，此言不假。”

早在几年前，在一场主题为“中国文化旅游品牌发展”的高峰论坛上，中国古城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林鹏就曾表示，中国有2000多座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古镇，但让人记住的不超过8座。

一边不停吐槽，一边不停涌入

但不争的事实是，在目前中国的旅游市场，即便是古镇千城一面的现象越发突出，也依然抵挡不住游客的脚步，古镇游依然是众多游客热衷的旅行选择。所以，也由此衍生出一个现象：一边是去过古镇的人不停地吐槽，一边是旅游者不停地涌入古镇。

记者从国内几大著名的旅游网站上看到，古镇被吐槽最多的便是“太像，无特色。”很多网友甚至罗列出古镇游的“几大像”，比如：地面都是石板路、建筑都是木瓦房、吃的都是小零食、看的都是人后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个古镇的旅游广告依然占据着网站醒目的位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古城文化热爱者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其实也称不上奇怪，毕竟相对而言古镇游的成本不太高，大家更容易接受。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古镇游已经从纯观光转变到多形态的阶段，融入了餐饮、购物、表演等形式，内容丰富了自然会旅游者们更加喜爱。”

不过，这位古城文化热爱者也指出，正因为内容丰富了，反而降低了古镇本身应有的品质。“旅游者喜爱什么，需求什么，开发经营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了这种喜爱和需求。”因此，古镇的千城一面就不可避免地形成

了，古镇游也变成了毫无特色的逛街购物、喝茶吃饭、参观表演的统一模式。

“空心”文化，变味的古镇

从词语解释上看，古镇一般指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供集中居住的建筑群，其本身都是各具特色，也拥有非常丰富深厚的人文底蕴，可是，为什么中国大多数的古镇到最后都会摒弃自己应有的特色，成为像一道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产品呢？

“‘空心化’就是中国古镇千城一面的最大成因。”一位古镇研究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背后的原因。该专家表示，空心化有两大特征：一个是造假，另一个是过度商业。

“我前不久受邀去中国南方的一座城市，那里就有一座古镇，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这是一座人工修出来的古镇。”专家略带气愤地回忆到，整个古镇就没有一点历史底蕴，全是仿古道路、仿古建筑，道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平时几乎看不到人影，店员都无所事事地闲坐或者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打牌，但是到了晚上和周末，古镇又是另一番景象，人来人往，全是来此吃饭娱乐的。“这样的地方怎么能称为古镇，顶多只是照着古镇模样造出来的一条餐饮街。”专家称，像这种凭空打造的古镇，在中国还有很多。

假的古镇令人感到气愤，但变味的古镇则是令人感到痛惜。该专家表示，必须承认古镇旅游绕不开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但是部分古镇出现了大规模重建、大量引进外来经营商的现象，再加上旅游房地产商的顺势推波助澜，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商铺林立、无特色旅游商品泛滥使得古镇的原有风貌遭到破坏，原有的古朴风格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个商业综合体，不利于古镇可持续发展。“古城镇中富有特色的民俗传统、民俗活动要么被肤浅的包装加以推广，要么随着古镇的商业化而消逝湮没。原真性缺失导致古城镇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开始被同化，失去了竞争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无数次地听到“文化”两个字，而古镇本身应该是文化游最佳的代表，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古镇开发打造虽高举文化旅游的旗帜，却偏离了文化的本质，只停留在文化的表层现象，最终造成千城一面，不得不说是最大的遗憾。

（记者：黄仕强）

遍布鼓浪屿的低调标识牌

【第一财经2017年7月25日】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近日宣布“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正式通过终审，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

位于福建厦门的鼓浪屿，被世界遗产大会评价为“见证了清王朝晚期的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是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是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华侨群体共同营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在长达数年的“申遗”历程之中，有一部分工作是针对鼓浪屿岛上近100处具有历史价值的街区、景观、建筑制作统一的说明标识牌。

常年关注乡村、民艺和跨领域合作的艺术家刘庆元与搭档杨小满一起受到邀请，与负责该项工作的机构合作，经过多番讨论、设计出最后的世界文化遗产视觉标识系统。那些标识牌赶在2016年10月评审专家上岛考察之前就已经全部安装完毕。

“在鼓浪屿，一面墙上可能有四五面牌子，奶茶店、手工咖啡、旅游地图，太阳帽小雨伞，各种大同小异的文创……而不远处是我们做的黑色的标识牌，它们并置在一起形成了有趣的怪象。这其实就是今天的特点，是人们在时代变革中所表达、选择、判断和承受的现状。”刘庆元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它们应该都在店里面，但每个人都在占据街头。”

2015年9月，艺术设计团队和文化遗产保护团队第一次在鼓浪屿岛上碰面，双方持续了几天的头脑风暴，大致决定下标识设计的方向。

“那里本来就已经有很多信息，各个商家的、风景区自己的，所有的都混搭在一起，而又都包含着各自对鼓浪屿文化不同的理解和需求。我们的工作是基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严谨、专业，要经得起推敲，”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综合三所所长邹怡情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同时，标识是为文化遗产作解释说明，但它并不是展示的对象。说明牌不是店铺招牌，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上面找到最为准确的信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终标识牌呈现的效果非常低调而隐蔽。如果是走马观花的游客，很可能注意不到每一处历史遗迹旁边竖立的标牌。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标识牌的文字、建筑图纸、历史照片等是由鼓浪屿

申遗咨询技术团队，即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提供，而艺术家和设计师则需要为最后呈现出来的视觉设计付出努力。包括标识牌的颜色、材质、字体、排版以及游览地图、游客手册的平面设计。

原本鼓浪屿上的历史保护建筑都有标识牌，由厦门市政府于2002年左右安置。它们大部分都是盾形、由大理石与铜制成，上面有建筑外形浮雕，但功能仅仅是说明这里是被保护，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信息。这次重新制作竖立的标牌，则以科学规范的文本、图示，向游客、专家、本地居民说明，在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之中，这每一处具体的建筑、街区有怎样的特点，对应了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

比如，位于岛东部的别墅群“海天堂构”，是厦门市“重点历史风貌建筑”，当中有一个咖啡馆、一个南音与木偶戏表演艺术中心，还有建筑艺术馆。游客浏览至此，却无法知道更多信息。

在新标识说明牌上就有了更加权威详细的文字：“由菲律宾华侨黄秀琅和黄念忆建于1920年到1930年间。原址为西方人建造的厦门俱乐部，黄氏购置后在其基础上改造建设。与之前西式俱乐部相对自由的布局不同，海天堂构建筑群采用了具有中国传统礼制空间意向，主次分明的中轴对称格局……中楼高两层，矩形平面，前面及两侧设置外廊，当中作‘出龟’处理。屋顶为岭南风格歇山屋顶，‘出龟’的门廊上作重檐四坡攒尖顶，屋顶屋脊、飞檐、檐口下均设预制传统题材的灰塑或木雕装饰构件，做工精美。中楼的整体风格呈现厦门装饰风格与‘嘉庚风格’的折中，堪称鼓浪屿中西合璧的代表性建筑。”

视觉设计层面，刘庆元首先就定下了基调：去轻浮化、去风情旅游化、不要炫技和吆喝，要融入和体现申遗技术团队梳理出来的科学而规范的必要信息，就像大家合作做一本在地文献。他戏称这叫“安静的严肃设计”。

“不刻意凸显‘设计感’，与那些没有形容词、比喻句的科学表述文字风格相统一。”他说，“岛上到处都是卖弄的、强调感官刺激的东西，那些花花草草的帽子、把贝壳剖开放在街边让你看里面的珍珠……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些，那就通过标识设计来传递应有的专业表述和基本立场。”

一开始，艺术家和设计师通过海岛、沙滩等热带景观提炼了许多视觉元素，最后将标识牌的主色调定为蓝与深灰。蓝色呼应大海和天空，深灰色则

源自闽南传统建筑大厝的灰瓦屋顶、西洋式建筑上的抹灰。他们认为，标识牌就不该跳脱出来吸引人们的视线，而应当沉入周围环境之中。

“鼓浪屿的文化很多元，东方、西方、古代、现代，视觉已经很丰富，标识牌就希望简洁、理性和传递必要信息，而不是按耐不住的旅游气质。鼓浪屿已经完成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本地化过程，我们要做的是向世界介绍这些。所以标识牌也同时应当是国际化的，反映现代的精神。”邹怡情说。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无论是不锈钢钢板、表面烤漆质地，以及文字字体与版式都与鼓浪屿的精神气质相符。刘庆元说，熟悉鼓浪屿的人一向认为岛上有两张脸，一面朝向游客、一面朝向本土居民，希望今后可以通过标识牌找到真正属于它自己的那张脸。让人们意识到，“来鼓浪屿不只是吃海鲜，不只是自拍，更重要的是保持距离，感知时间的书写。”

（钱梦妮）

时事评论

祁连山被点名，风景名胜区要警醒

【中国建设报2017年7月26日】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督察处理情况及其教训通报全国，包括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因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被严肃问责，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释放出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强烈信号。

虽然此次通报对象为自然保护区，然而祁连山一事对于我国2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言，同样是一次严肃的警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样为国务院授牌，同样强调以资源保护为前提。不容回避的是，在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正面临着资源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矛盾和风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早已被历史反复证明的规律。

想法决定做法，理念指导行动。严守生态底线，推动绿色发展，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刻不容缓。纵观近年来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案例，一个共性问题的发展理念不对头，忽视乃至无视生态环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这种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做法，不仅危害当地可持续发展，更会祸及子孙后代。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只有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子，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迈向永续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解决好的课题。“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在不少欠发达地区，生态问题往往与贫困伴生。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绿色发展是必然抉择、必由之路。各级干部要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从过多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向依靠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发展的轨道上来，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的致富靠山。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对执政能力的现实考验。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要切实统一思想 and 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守生态安全底线，着力推动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共同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新华）

国家公园：保护第一 公益优先

【中国绿色时报2017年7月31日】国家公园与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是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建立完整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全球公认最有效的自然保护手段。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综合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是尚未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总体部署，为中国加强生态保护、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保

障民生和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自1956年以来，中国陆续建立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水源保护区等十几个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数量已经过万，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0%。这些自然保护地对保护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代表性生态系统、壮美的自然景观、重要的地质地貌和历史文化遗迹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大熊猫、藏羚羊和朱鹮等濒危物种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申报和管理以及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虽然中国在自然保护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还远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享受自然美景、身心健康和精神文化价值的需求，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美丽中国的要求。因此，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初衷就是要树立“生态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优先”的理念，三大目标并重，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代表性，理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的有效性，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

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代表性，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是各种构想的集合，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多种多样的厚望。提起国家公园，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极具震撼力的名川大山、蓝天白云、壮美的峡谷和瀑布、魔幻般的山峰和冰川、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自由咆哮的野生动物、尽情飞翔的鸟、清澈流淌的河流、湖边篝火旁的畅谈和自由自在的家庭旅行。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1872年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当时，美国正处于鼓励人们征服自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时期，大量森林被砍伐、成千上万的美洲野牛等野生动物被猎杀，自然景观被破坏。因为尼亚拉加瀑布的毁灭性开发，美国被欧洲游客耻笑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同样，约塞米蒂山谷等壮美的自然景观区也被少数人开发占有。建设美国国家公园的构想，正是为了遏止这些野蛮的开发行为，为了当代和未来世代的利益，保护那些非常重要的自然遗产免遭破坏。然而，美国国家公园也经历了大量修建道路、旅馆和宿营地，开发旅游景点、吸引大量游客，猎杀野生动物，忽视当地原住民权益等过度开发的阶段，这些自然保护地也曾经沦为商业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科学发展和保护意识的提高，荒野保护、物种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恢复、社会公平和公民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公园构想的主流。尽管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存在着旅游开发与自然保护拉锯式的演进过程，然而相关的立法和执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国家公园组织法赋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重要使命，即“为了当代和未来世代的利益，保护风景、自然、历史遗迹和野生生物，使其维持未受损害的状态”。美国陆续颁布的《荒野法案》《濒危物种保护法案》和《野性和风景河流法案》等，逐步确立了“生态保护第一”的国家公园理念。

国家公园是珍贵的自然瑰宝，是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精华，是最重要的代表性生态系统的核心，荒野区域的代表、野生生物的乐园，还是自然实验室和自然保护的指针，也是大众游憩的胜地和人类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不是把现有的所有自然保护地都统统叫做国家公园，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符合国家公园标准的自然保护地直接转成国家公园，或者对符合国家公园标准的两个或多个自然保护地整合组建或扩建成为国家公园，也可能在符合标准的区域新建国家公园。与此同时，对于未划入国家公园的其他所有自然保护地类型，按照统一的分类标准进行系统的科学分类。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自然保护，解决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重叠交叉、多部门分头管理等问题，立法规划等也存在部门利益难以一致、保护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不清晰、支付责任不匹配，导致政府投入不足、公益性缺失的问题。因此，建议统一规划与管理，从根本上解决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地的现状，以保障国家长远利益和生态安全为出发点，行使相关的监管职责和提供资金保障，制约强烈的过度开发冲动。通过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事权和资金保障的机制建设，来充分体现国家公园体制的“生态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优先”的核心理念。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目的是在整合组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的基础上，配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开展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的系统评

估，推动跨部门公众参与的社会立法，依法界定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资金机制，监测、监督和考核机制，理顺和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遵守和执行同一个法律，依法管理好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最终实现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依法管理。

理顺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世代传承自然遗产

建设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必须坚持自然保护第一、严格保护、有限制地利用的理念。因此，应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目标与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全方位结合，尤其是要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和管好生态保护红线紧密结合，选择自然价值和风景文化价值最高的区域整合组建或划建国家公园，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确保其自然状态不受损害、自然与文化价值不降低。同时，借此时机，对其他所有的自然保护地类型进行科学梳理，该严格保护的要严格保护起来，需要恢复的区域得到恢复，需要其他方式干预的进行合理的干预。对那些允许可持续自然资源利用的区域进行合理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国自然保护地的有效管理。

中国历史悠久，没有人居住和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地很少，没有人烟的荒野区域也不多，多数地方，包括自然保护地内和周边地区都有长期的或短期的人类活动。建立国家公园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移民搬迁。因此，保障和提高当地（国家公园内及其周边地区）居民的利益，让他们参与国家公园治理与管护，为他们寻找替代生计来源，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有效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建议根据自然资源权属和资源利用的传统，提供社区参与国家公园规划设计和方案制订、实施，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的协商与决策，充分保障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作者：朱春全）

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可以并行不悖

【中国旅游报2017年7月28日】近日，在波兰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双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媒体舆论八

方来贺，世界遗产保护和开发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表示，连续十多年的申遗成功，固然可喜可贺，而清醒、理性、反思、谨慎，则是当下应有的态度。

在申遗常态化的今天，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的成功还能引来无数网友点赞、舆论媒体争相报道，这确实是令人欣喜和欣慰的好事，说明公众意识、媒体意识正在增强，正在与国际接轨，这顺应了当代中国全球化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世界遗产评审会每年都掀起一次公众关注世界遗产的热潮，大会也成为普及保护理念、传承世界遗产的契机。虽然中国地大物博，具有原真性的独特之地众多，不管申遗与否，它们的价值都在那里，但是通过申遗这种“加冕”的形式，不仅让遗产地的价值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同时也让公众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进而达成保护共识，让世界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给遗产地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而易见，旅游无疑是与世界遗产关系最密切的行业之一，是世界遗产最大的受益者。据悉，申遗刚一成功，在某大型OTA网站上搜索预订鼓浪屿自由行、跟团游游客的数量增长已超60%；而可可西里在申遗成功当天其旅游热度也暴涨了248%。

世界遗产的品牌价值不仅意味着获得国际认可，提高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知名度，还可以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保护措施。这无异于使遗产地获得了“国际通行证”，为其跻身“国际旅游热点俱乐部”开辟出一条捷径。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加入审议热潮当中。今年是中国申遗30周年，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2处，成为意大利之后世界第二大“世界遗产国”，可谓“数一数二”。

世界遗产该保护还是开发，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极有争议的热点话题。笔者认为，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做到逻辑自洽，绝非一些人感觉的开发和保护如同一对反义词，不可兼得。世界遗产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标志，依据《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可以看出，世界遗产本身其实是基于保护目的设置的，因此保护当然是前提，同时也最为关键。世界遗产着重对全球全人类最具价值的部分予以保护，只要申请地具备独特的价值，能够充分体现其原真性的自然风貌或文化情景，通过国际审核标准，就可以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正是因为这种原真价值的独特性，使遗产地具有了品牌价值，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很容易转换为旅游资源，或者成为旅游开发的基础，进而为旅游目的地产生商业价值。

对世界遗产的申报及其旅游开发进行广泛宣传推广，让更多的人参观、了解它，就需要动用一定的社会资本，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商业特征，只要其商业化程度不违背其原真性的价值，就不能算过度开发，就是可以接受的。若想要长期利用这种商业价值，就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予以合理开发利用。如果不顾后果，一味盲目开发，使遗产地的独特价值弱化或者丧失，那么商业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看到，旅游者是因为遗产地的某种独特性而为之吸引，一旦这种“令人向往的旅游地所具有的特色”消失殆尽，游客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要想真正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世界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利用，就必须把保护放在首位。必须因地制宜制定出预测承载量的科学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制度，在尽量不提高游客游览成本的前提下，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根据景区承载力控制客流量，实现景区智能动态管理。

我们需要批评和遏制的是杀鸡取卵、舍本逐末的行为，而不是旅游发展本身。真正的旅游发展必须追求可持续发展，基于保护基础上的发展，这与世界遗产本身出于保护的目的地而设立，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只不过世界遗产强调的是保护遗产地的独特价值，而旅游发展侧重的是如何为长期可持续地开发利用而进行保护，二者的思考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本质都是需要真正切实的保护，旅游开发的目的是从保护中获益。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要在世界的平台上，以与世界接轨的方式加强保护，接受全世界的监督。

世界遗产促进了旅游，旅游带来了发展。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理清、理顺，让遗产地既具有品牌价值，又能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世界遗产旅游开发之良策。国内的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等称得上是佼佼者。九寨沟“沟内游、沟外住”，峨眉山“山下度假、山里观光”，青城山“保护核心、发展外围”，它们无一不是坚守保护核心、力求发展的原则，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2018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实施申遗新政，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并将向目前没有世界遗产或世界遗产数量较少的国家倾斜，同时国际社会将进一步关注世界遗产保护状况。

申遗成功意味着得到国际认可，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保护传承世界遗产方面对世界做出的一种承诺。我们务必秉承理性申遗、科学保护、永续传承的发展理念，坚定文化自信，认真履行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全面加强世界遗产监管保护，创新中国经验，创造中国奇迹，力求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话语权和国家软实力。

（刘思敏）

世界遗产

日接待量突破1.8万人 莫高窟游客爆满不堪重负

【央广网2017年7月27日】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进入暑期不少景点都迎来了旅游热潮，如果您想到甘肃省敦煌市的莫高窟看看要做好心理准备，网络6000张门票快速售罄，现场12000张应急票销售一空，这就是莫高窟当下火热的人气。

据了解，为了保护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参观活动严格执行预约制，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控制在6000人次。为了应对每日的客流量，景区特别推出了应急票，即便如此，门票依旧供不应求。庞大客流冲击下的莫高窟面临着哪些问题？面对如此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又能为做些什么呢？

本月开始敦煌莫高窟迎来了暑期旅游旺季，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本月11日起莫高窟日接待量多次突破1万8千人。

正在敦煌旅游的赵女士因为没有提前在网上预约购票，排了很久的队。据她介绍，目前莫高窟可以用摩肩擦踵来形容，排队时间基本就要用上40分钟，大大压缩了参观的时间，加上天热人多，洞窟内空气混浊，参观体验不是太好。

截至7月25日，莫高窟本月以来已经接待游客277544人次，其中接待像赵女士这样的应急参观人数就达到125046人次。据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李萍介绍，预计今年7月要比去年同期参观人数增加6万人次。

“莫高窟向来7、8、9月是游客高峰，一般接待量占全年70%以上。但从今年开始，提前一个月网上发售的6000张票基本发售不久就全部售罄。从这四五天来看，今年游客暑期的超大客流最高峰就到了，昨天上午不到九点就售光了12000张的应急票。”

据了解，为了保护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参观严格执行预约制，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控制在6000人。在今年7月、8月旅游旺季，于7月单日、8月双日发售应急参观门票12000张以满足旅客的参观需求，但即便如此，门票时常供不应求。窟区内人潮汹涌的景象让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颇为担忧，“游客在一个遗址上超过一定数量，两方面都会有影响，一方面是对文物的保存和安全，长期积累会造成一些破坏。另一方面，游客来是为了解文化遗址的价值，但来了以后什么也看不到，对游客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我们到每年这时接待压力非常大，处于两难状况。如果把洞窟关掉，游客就要在窟区外面排很长很长的队，但如果不关洞窟的环境会恶化。”

此外，莫高窟能够接待大型旅游团体的洞窟十分有限，这也让为数不多的大型洞窟负荷很重。李萍指出，在南区区域里可供开放的这种大型洞窟有限。从监测上可以看到，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是要发生很明显的变化。二氧化碳的衰减很慢，可能会引起壁画、塑像变色的情况。另外二氧化碳很高的情况下，游客进去以后感觉到洞窟气味很不正常，大客流的参观打破了洞窟内小环境的平衡。

如今的局面考验着景区管理者和旅行社，他们不仅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还需要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何保护这些珍贵而脆弱的“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历史和自然遗产，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敦煌国宾旅行社经理张宁告诉记者，为了给莫高窟“减负”，当地旅行社在旅程规划时会刻意分流人群去往附近别的景点。“我们会提前把一些游客规划去看其他景点，比如敦煌的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或阳关、玉门关、影视城等，把时间段相对地进行分流，更好合理的安排游客有充分的时间进行

参观。”

不过莫高窟始终都列在每一位前往敦煌游客的必去清单里。张宁说，为保护莫高窟，在带游客前往窟区前导游都要多次强调进窟注意事项。“把大的背包、遮阳伞、相机寄存，进入窟区以内严禁游客用手触摸壁画，严禁游客用手机进行拍照，闪光灯会对壁画造成一定的影响。”

近日，敦煌研究院借由莫高窟参观预约网发出呼吁：“莫高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保存了1650年的极其脆弱的人类文化瑰宝，她实在承受不了连续如此拥挤的人潮。”研究院同时提示大家，除了窟区遗址，游客还可以在窟区外免费参观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及莫高窟美术馆。

李萍介绍，游客不需要全部挤在窟区内，这几个展馆展品精美，能有效增进参观体验。“窟区前面有一个陈列中心，有8个复制的洞窟，这8个洞窟都是老一代资深的敦煌研究院的画家花很长的时间临摹的精品，和洞窟是一样的，很多人看了都觉得特别精彩，会觉得做了一个很大的补充。”

此外，李萍还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前往敦煌莫高窟的游客，务必登陆莫高窟参观预约网进行预约购票，方便合理安排行程；二是希望游客可以选在春、秋季再来敦煌，届时莫高窟人流适中，游客可以深入体会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韵味之美。

（记者：孟永辉、王妍）

环球博览

山水长存 天人各宜——法国国家公园面面观

【光明网2017年7月24日】法国很早就意识到保护自然及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早在路易十四时期的1669年，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的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就在《森林保护条例》中第一次明确了对一片100~200年生的乔木林地进行保护的条款，他也被视为法国自然保护的先驱人物。

1853年，法国便设立了第一个风景区，被视为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的雏形。1963年7月，位于阿尔卑斯山地区、隶属萨瓦省的法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瓦娜色国家公园正式建立。

目前，法国设立了10个国家公园，以及近50个地方级自然公园，旨在保护公园中的植被、动物、景观及文化遗产，同时保证当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覆盖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

尽管法国国土面积不大，但国境内却有着形态各异的生态区，加上法国的海外殖民地，法国国家公园保护的生态系统可谓丰富多样。法国本土及海外省的国家公园分别为7个和3个，这10个国家公园几乎囊括了全法境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多种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它们分别是：以克罗斯港国家公园及蔚蓝海岸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和岛屿生态区；以瓦娜色国家公园、埃克兰国家公园、梅康图尔国家公园及比利牛斯国家公园为代表的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脉高地生态区；以策文涅斯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山地生态区；以法属圭亚那亚马孙公园为代表的热带雨林生态区；以留尼旺国家公园、瓜德鲁普国家公园为代表的火山群岛生态区。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瓦娜色国家公园及蔚蓝海岸国家公园分别代表的山地生态区和地中海沿岸及岛屿生态区。作为法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瓦娜色国家公园东部紧靠意大利大帕拉迪索国家公园，两个国家公园于1972年7月8日合并。瓦娜色国家公园以羴羊闻名，生活着众多珍稀的哺乳类动物，同时还是重要的植物和鸟类保护区。据统计，目前园区内共有约1900只羴羊、4100只岩羚羊、125种鸟类以及1200种罕见珍稀的野生花种。在公园里，可以看到全法仅在萨瓦和上萨瓦地区才能找到的三趾啄木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岩雷鸟、野生羚羊、大胡子秃鹫，以及可爱憨厚的野生土拨鼠。

而作为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公园，蔚蓝海岸国家公园面积520平方公里，其中85平方公里是陆地，其余是海洋，它包括了在马赛近郊约20公里长的天然岩石峡湾群，以及其间的森林和海洋，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可以看到独特的红褐色石灰石岩壁、小海滩，有些地方只能靠皮划艇才能抵达。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免遭破坏，政府设立了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交通

工具入内，游客只能徒步在公园内参观，并按规定在公园内进行攀岩、潜水、皮划艇等运动。

严格限定人类活动干扰

法国国家公园大多位于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建立国家公园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动植物栖息地和自然景观；二是开发山区旅游资源，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国家公园一般划分为3个区域：自然区域、公园游览区及外围地带。自然区域为特别保护区，严禁公众进入。公园游览区及外围地带允许开展野营、狩猎、捕鱼等休闲活动，也可以修建服务设施、商业网点、体育设施及食宿设施等，以吸引和方便游客。但为保护动植物和自然生态，对这类地区的开发活动也进行了一些限制。

与之相对应的，从19世纪末至今，法国各类自然保护区已发展到100多个。这些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稀有或濒危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例如比利牛斯岩羚羊、秃鹫、骨顶鸡等野生动物，高山植物、水生植物、萨王纳植被等各类植物区系，以及一些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如冰湖、沙洲、海洋、湿地、森林、海滨、沼泽、高山等。

与国家公园不同的是，这些自然保护区均不供游人观赏，严防被破坏。自然保护区由所在地区政府部门或从事自然保护的协会负责管理，费用则由国家环境部承担。

不断健全环保法规

法国政府以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由来已久。自19世纪开始，法国陆续颁布了《森林法》（1827年）、《山地造林法》（1860年）、《山地恢复和保护法》（1882年）以及《私人造林免税法》（1943年）等与自然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战后，法国在1957年7月颁布了《自然保护区法》，1960年颁布第一部有关建立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法规《国家公园法》，首次提出了爱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环境和平相处的发展理念，1976年又颁布了《自然保护法》等。上述各部法律的推出，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国家公园及自然公园的建设和发展。

2005年2月28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部环境法规的集大成者——《环境宪章》，将环境问题置于国家法律最高等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宪法保

护公民环境权的国家。该宪章将环境利益上升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对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了宪法性解释和说明，明确规定：公民享受健康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神圣不可侵犯。《环境宪章》至此成为法国现行的1958年宪法的一部分，并被赋予了和1789年《人权宣言》及1946年《宪法序言》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

建立适合国情的管理机制

然而，多部法律的繁杂条款，以及原先基本套用美国模式实施中央垂直管理、脱离地方政府及当地社区，给处在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和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也让地方政府及社区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从2006年起，法国政府开始改革国家公园体制，注重保护和利用二者兼顾。主要的方式就是形成国家公园与周边区域的共同管理，并带动地方绿色发展。中央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共同签署宪章，制定法规、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再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政府和专家等多方共同组成的国家公园董事会决定如何管理。法国环境部及有关部委的地方机构、社会专业团体以及科技、文化、旅游等部门共同组成委员会，参与管理事务。

国家公园的周边区域都成为加盟区，只要在加盟区范围内，地方政府、社区及民众都能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受益。建立了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是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成果之一，它使相关产业都能受益。

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应对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法国也在不断完善环保模式和理念。2017年初，法国新成立的“生物多样性署”正式挂牌办公，该机构由国家水资源和水环境局、自然监测技术中心、法国国家公园及海洋区域管理局和国家植物保护委员会合并组成，主要负责自然资源管理与保护，包括海洋公园管理、环境保护及防治外来入侵物种。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法国有近9%的哺乳类动物、24%的爬行类动物、23%的两栖类动物、22%的淡水鱼及32%的筑巢鸟类濒危。2016年8月，法国曾出台一项生物多样性恢复法令，要求尽可能抢救、保护濒危动植物，并提出将根据该法令设置生物多样署，旨在整合各

方力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共政策，整治与土壤、水域及海洋相关的动植物多样性问题。除环境及能源管理署外，生物多样性署是法国解决环境问题的第二大机构。

中法开展国家公园合作

在不断加强与完善本国境内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法国也积极在世界范围内与各国开展交流合作，希望携手共同应对复杂的挑战。2016年，法国开发署与中国国家公园试点之一的仙居国家公园之间的合作成为中法两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一个典范。法国开发署是一家法国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共金融机构，成立于1941年，2004年在华设立代表处，主要业务是减少城市发展的环境影响、促进低碳发展模式、保护自然资源及生物多样性。

位于浙江省的仙居国家公园是中国首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之一，自2015年11月仙居国家公园向国家发改委及财政部提交贷款申报后，法国开发署先后6次组织相关专家前往仙居进行实地甄别考察、调研评估，最终达成“仙居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发展利用示范工程”。法国开发署投入7500万欧元低息贷款，并获得发改委及财政部的批准，正式将贷款列入仙居国家公园的规划。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自然遗产保护工程、生态修复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社区发展和能力建设七个方面。

（记者：黄昊）

编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风景名胜》编辑部

网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电话：010-88315330 88315324 传真：010-88315325（F）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

联系人：张立 陈晨 邮编：100044
